

陈宝胜 陶梅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仅关乎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更关乎党的思想理论根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在于通过广泛深入的传播，武装群众、指导实践，并最终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革命文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实践的历史见证，承载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密码，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精神品格与优良作风。基于此，为充分挖掘和释放革命文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中的独特价值，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革命文物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办，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南湖革命纪念馆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承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革命文物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召开。

研讨会设主旨论坛和三个专题分论坛。主旨论坛六位专家聚焦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革命文物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法论、研究选题与基础理论展开研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熙国认为文化创新存在“批判继承”“抽象继承”“综合创新”三种方法。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红民结合近现代人物研究的实证案例，系统阐发了“概念史”研究方法的学理价值、研究路径、操作要点、潜在问题与局限性。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福进以“红色仪式”为选题，对大党国典礼制度建设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尚虎平从公共管理学科视角，系统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事业奠定的理论基础。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堡骏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阐释，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中心论现代化理论的彻底超越，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包大为认为，革命文物作为“感性经验载体”，是实现从“感性经验”到“知性辨识”再到“理性概括”这一知识构建过程的关键锚点，为从具象历史中把握现代化脉搏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百年马克思主义社会传播研究是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着力推进的重大课题，旨在从路径、语境、话语、载体、技术、机制、方法论和能力等维度，深入剖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核心要素与内在机理。聚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播”，分论坛一展开了系统讨论。传播话语与语境方面，温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尚励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传播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推动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方式的系统性变革；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董海樱以《新青年》的政治转向为中心，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及其理论本土化的初步构建过程。传播路径方面，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赵心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完成了从单向封闭的线性传播向互动开放的生态化传播的范式转型；温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琼结合温州移风易俗改革经验，提出党的文化引领是一种融合制度设计、媒介技术与群众参与的“传播治理”过程。聚焦传播载体与技术的现代演进，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桑建泉探讨了数字技术驱动下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逻辑与实践进路。针对传播能力与空间视域，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何晓跃提出，有效的国际传播不仅是为了“说故事”，更是要为“聚共识”“促合作”，旨在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为中国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革命文物的基础理论与保护利用实践研究，是浙江大学—南湖革命纪念馆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致力研究的重要问题。分论坛二聚焦“革命文物理论与实践”开展了充分研讨。基础理论方面，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庞毅认为，革命文物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四大构成要素，即革命文物的时间、主体、内核和来源，它们相互影响，与对“革命”的理解紧密相关；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立程提出，革命文物教育的理论建构既要反映教育本质，也要揭示文物教育的功能、价值、特征，更要聚焦于革命文物这一特殊类型文物的精神禀赋。保护利用方面，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丁乙通过分析知识分子的参观日记，揭示了革命文物通过多重感官机制激活身体记忆与历史想象，触发复杂情感反应，并在讲解引导、集体参观等机制下，转化为政治认同的复杂过程。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研究员毛若寒则在分析技术介入革命文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与风险的基础上，提出“基础—认知—交互—保障”四维实践路径。此外，学者尤其关注数智化时代革命文物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尤云弟认为，智媒时代抗战历史的媒介记忆生产正从权威叙事、线性叙事与定期仪式，转向多元建构、网状互联与常态浸润，同时警惕历史虚无主义、集体认知窄化等倾向。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晓梅基于文化记忆理论，将革命文物视为承载民族记忆的关键载体，主张通过价值重构，将文化记忆功能贯穿保护与利用全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主阵地，也是实现革命文物有效利用的关键途径。将革命文物承载的深厚历史有效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构建融通历史与现实、贴近受众的话语体系，对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盘活革命文物资源具有深远意义。分论坛三聚焦“思想政治教育与话语”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房维维认为，在“文物·知识·信仰”的转化链条中，革命文物的价值通过生产、传播、接受与规范等环节逐步释放，并在数字化、教育化与制度化机制中不断深化；中国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教师郑惠珊从价值、困境、治理三个维度，审视了浙南革命精神融入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问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盛品钧分析了革命文物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强调革命文物作为文化遗产、政治符号和历史凭依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契合。此外，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问题也是青年学者关注的重点议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靳思远发现，人工智能在赋能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也会诱发幻觉问题，具体表现为历史虚构、逻辑紊乱、情感失真和价值偏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陶俊怡认为，数字记忆通过平台化记忆、记忆信息库和记忆共同体的动态运行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新锚点”，但也面临着内容失真、舆论操纵、价值认同弱化等风险。

论坛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革命文物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从基础理论、研究选题与方法论创新三个维度，系统阐发了革命文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载体、传播载体的独特价值，为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革命文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国家认同建构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多重功能提供了学理支撑，也为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理论思考与创新视角。展望未来，期待学界同仁聚焦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革命文物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拓展研究议题、拓新研究方法、创新研究理论，产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携手推动这一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的研究领域不断走深、走实，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贡献智慧。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忠诚与信仰的见证

——从文物看“隐形将军”韩练成

刘勇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1953年)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的“隐形将军韩练成”专题展览中，一件件实物静静陈列。它们承载着韩练成将军跌宕起伏的一生，见证着他作为中共隐蔽战线杰出代表的忠诚、智慧与淡泊。这些文物不仅是历史的遗存，更是解读他革命生涯与精神品格的钥匙。

职务任命文书：从使命担当到信仰归宿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1953年）》，长32厘米，宽27厘米，红色栏框上端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从右至左的黑色字体清晰记录：“兹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任命韩练成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落款处“毛泽东”的蓝色草书签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的鲜红印章相互印证。

这纸任命背后，是韩练成从国民党高级将领到人民政权参与者的转变。1948年年底，他脱离国民党军队回到共产党的阵营，此前在莱芜战役中主动放弃指挥权，为解放战争胜利立下关键战功。1953年的这一任命，既是对他军事才能的认可，更是对他选择人民立场的肯定——从“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到为新中国建设效力，文书上的每一个字都镌刻着他“向往光明、追随共产党”的坚定选择。

《国防委员会委员任命书（1959年）》，长41厘米，宽28.5厘米，上面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韩练成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的字样，落款处为刘少奇的红色签名，体现了韩练成在新中国国防领域的贡献。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师长、集团军副参谋长，到解放战争中的军长，再到新中国的国防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变迁串联起他始终坚守的“一致抗日”“和平建国”主张。这张任命书，是他从战场到建设岗位，始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先的生动注脚。

军旅信物：硝烟中的忠诚印记

在展厅中，摆放着一顶55式礼服军帽和两对肩章。军帽以棉麻纤维制成，高10.5厘米、外径26.4厘米，正红色帽墙丝带与蓝色帽顶相映，帽檐前方的八一军徽格外庄重；配套的肩章为金黄色红边，两颗黄铜五角星象征着中将军衔等级。1955年，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这套装束正是他军人身份的直接体现。

授衔时，周恩来曾告知他：若按起义的“国军”军长身份，可授上将军衔。但他

淡然表示：“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功名利禄。”军帽上的八一军徽与肩章上的五角星，恰如他对信仰的纯粹——比起军衔高低，他更看重“为人民解放事业效力”的初心。

另有一件20世纪60年代绿军大衣，长128厘米，宽118厘米，棉麻、褐色衣领与胸前整齐的扣子透着朴素。20世纪60年代的韩练成已担任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等职，这件日常穿着的军大衣，褪去了战时的紧张，却保留着军人的严谨。

从北伐战争时期的排长，到解放战争中的军长，再到新中国的军事研究者，军旅生涯贯穿了他的大半生。大衣的棉麻材质虽普通，却像他的性格——不事张扬，却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深入龙潭虎穴”的勇气。无论是在国民党阵营中传递情报，还是在新中国参与国防建设，这件大衣所象征的军人底色从未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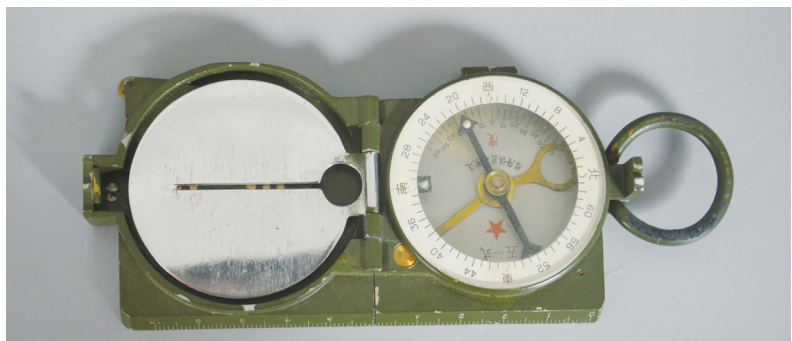
解放初期的“五一式”指南针，铁与玻璃材质，通长14.8厘米，宽6厘米，上有“维隆仪器厂制造”字样和红色五角星。指南针不仅是军事工具，更暗合了韩练成的人生选择——在复杂的历史迷雾中，他始终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行。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防研究院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的希望”；1942年与周恩来会面后，他明确了“投身革命”的方向。这个能精准辨别方位的工具，恰如他对信仰的执着——即便身处国民党核心圈层，面对“清共”风波、政治



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证(1964年)

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证(1975年)



清前期“大一统”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邓涛在2025年第9期《北京社会科学》撰文《从清前期中国“大一统”历程看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认为：清前期（从入关至乾隆末年）的“大一统”历程，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在连续性方面，清朝君臣认为元朝等少数民族王朝也可以传承中华统绪、有人主中原的权利，清朝统一边疆时借鉴了过往王朝经略边疆的经验，一些边疆民族首领亦了解自身与中原的历史联系。在创新性方面，清朝在中央和地方层面的边疆管理制度会因时制宜变革；清朝还对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得帝王庙祭祀范围更符合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在统一性方面，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地方贵族，或是各族兵民，都深度推进或参与了大一统进程，为清代中国统一做出了贡献。在包容性方面，承德地区各民族汇聚，宗教多元，各民族相互交融。在和平性方面，清朝优先以和平方式推进边疆统一，且在统一后并未对外扩张。

漩涡，他从未迷失，始终以共产党的战略目标为指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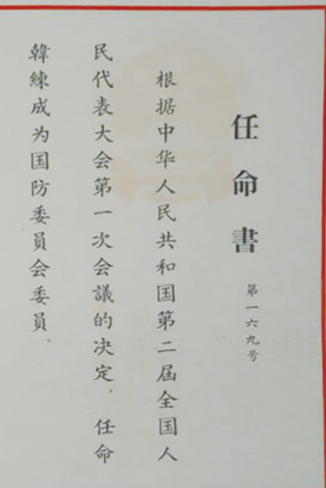
代表证书：从民意嘱托到初心不改

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证（1964年）红色封皮上，“韩练成”“五十六岁”“代表单位：甘肃省”清晰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印章印证着这份荣誉的分量。这是他从事军事领域走向参政议政的见证。

作为第一、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始终关注民生与国家建设。这份代表证背后，是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信念——即便曾是国民党高层将领，他始终记得自己是“宁夏固原人”，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正如他在隐蔽战线工作时，始终以“整体战略高度”为目标，从未偏离“为人民解放”的初心。

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证上，“选举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注，呼应了他“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的身份。此时的他虽已年过六旬，却仍以军人的担当履行代表职责。

从1925年加入西北陆军军官教导队，到1984年病逝前始终关注国防建设，他的一生与军队紧密相连。这张证书不仅是对他资历的认可，更是对他“一生为党、为军队”的肯定——无论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潜伏”，还是在解放军中任职，他对军队、对国家的忠诚从未改变。



国防委员会委员任命书(1959年)

文物背后：信仰的力量与精神的传承

这些文物串联起的，是韩练成将军“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的隐秘历程：1927年与刘志丹的相遇，让他初识共产党；1942年与周恩来的会面，让他明确了秘密工作的方向；1950年正式入党，他终于实现了夙愿。正如周恩来对张治中所言：“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他并非因“受排挤”而选择共产党，而是在看清历史方向后，主动将个人命运与人民解放事业紧密相连。

如今，这些珍贵的文物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被精心陈列。它们在无声中诉说着一段震撼人心的传奇——关于一位曾被毛泽东盛赞“能调动国民党百万大军”的神秘将领。从泛黄的职务文书到斑驳的军旅信物，每一件展品都是他“淡泊名利、忠诚向党”的见证——他不要上将军衔，只求“为革命奉献”；他不求声名显赫，甘当“隐形将军”。

硝烟散尽，精神永存。这些文物不仅是历史的遗存，更是红色基因的载体。它们让参观者看到：信仰可以跨越身份的界限，忠诚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韩练成将军的故事，正通过这些实物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以坚定的信念前行。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



55式礼服军帽



20世纪60年代绿军大衣

王湾三期文化并非二里头文化的前身

魏继印在2025年第5期《中原文化研究》撰文《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几个问题——兼议王湾三期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中，对王湾三期文化的性质、族属及其与夏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探讨。王湾三期文化早期的来源以尉迟寺类型大汶口文化为主，中晚期又吸收了郑洛一带仰韶系龙山早期遗存的文化因素。王湾三期文化背后的人群以东夷人群为主，同时也包括祝融氏、大隗氏、夏后氏等其他族群。通过对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等大型核心聚落演变分析，发现这些遗址的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缺环，说明王湾三期文化居民减少后，二里头文化是夏后氏重新占据这些遗址而形成的。二里头遗址为夏代的都城遗址，其下几乎不见王湾三期文化遗存，这也说明二里头古城并不一定为王湾三期文化人群所营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王湾三期文化并非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传统上认为王湾三期文化为早期或先期夏文化的观点值得商榷。